

涿鹿山房山云居寺研究

[日]塚本善隆
长广敏雄等 著

汪帅东 译



北京市方志馆
— BEIJING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房山云居寺

研究

[日]塚本善隆
长广敏雄等 著

汪帅东 译



北京市方志馆
BEIJING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房山云居寺研究 / (日) 塚本善隆等著; 汪帅东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502-8028-1

I. ①房… II. ①塚… ②汪… III. ①佛教—寺庙—
研究—房山区 IV. ①B947.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8518 号

房山云居寺研究

译 审: 曹 雯

责任编辑: 夏 艳 刘朝霞

责任校对: 吕永刚

书籍设计: 刘晓翔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 64256863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字 数: 301 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02-8028-1

定 价: 58.00 元

文献分社出品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由北京市方志馆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首次推出的《日文北京文史资料翻译丛刊》四部名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次出版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研究》、《白云观访信录》、《北京繁昌记》。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为北京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为广大读者认知历史上的北京打开了一扇新的门窗，增添了观察了解北京的一个新的视角，丰富其关于北京历史的知识；丛刊所收录的大量珍贵照片、拓片和各种图片、示意图，更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应该说，该丛刊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我们愿意在这里为丛刊的首次亮相叫好、点赞！

众所周知，北京地区是古人类较早的生息繁衍地，也是世界上建成比较早并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国北方重镇、六朝古都的北京，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建城历史、800 多年建都历史的世界名城。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其拥有的丰富历史文献资料和各种遗迹、遗物，一直成为历代人们不断发掘、探索和记述的对象。

可以说，人们对北京及其历史的关注，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撰研究和积累传播，经历了主要从个人私家分散进行到地方、国家机关组织的不同的阶段性发展。

而关于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北京历史的资料文献和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记载北京历史的各类文献资料，分散存在于经史子集与稗官小说、百家之书 1600 多种古籍中。民国时期，虽年代比较短暂，却也有极其巨大的新发展和可观的成就。一是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北京研究院、所；二是有骄人的成果：有《燕都丛考》《旧都文物略》《北平史表长编》等，更有 1938 年北平市政府设立北平市修志处，组织编纂了一部官修的记述北京市史志的鸿篇巨制《北京市志稿》。

新中国成立 66 年来，盛况空前，不仅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史地爱好者及其万千种类的成果；并且还有专门的研究、组织机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北京档案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以及极其丰富、硕果累累的重大研究成果。仅摘其要者简列如次：十卷本的《北京通史》、二十册的《北京历史丛书》和多卷本的《北京志》、《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考古集成》、《旧京述闻》，已经立项出版三十六种的《北京专史集成》（现已出版十多种）等等；我们还知道，在出版系统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大量的北京文史著作。此外，还有《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档案史料》、《北京史苑》、《北京社会科学报》等刊物报纸。仅以出版的数量而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关于北京文史的成果、著述已经远远超过自古以来历代数量的总和。

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统计，仅仅专著即有 20000 种以

上，其他论文、文章及资料则高于著作数倍。

自古以来，不仅国人对这一最负盛名的都城著述丰富、硕果累累，而且许多外国人也被北京的魅力所吸引，热衷于著书立说。其记述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也十分丰富。因其不同于国人的视角，而有着独特的价值。唐宋时期已有日本文化人士和僧人在其游记中涉及古代北京的一些记事，元代更有最为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 1275 年至大都，对北京——元大都宫廷等的记述颇为壮观、珍贵，长期影响了西方对北京的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极其巨大。

我们知道，在外国人所著的北京历史资料文献中，日本人的是最多的。稍感遗憾的是，在《北京历史文献要籍题解》所列的 40 部文献中，35 部均为西方人的英文著作，日本人的日文著作仅列出 5 部。其实，稍加检索，就能查到大量的日文著作。如《北京的历史》《北京风俗图谱》《清俗纪闻》《北京的史迹》等等，最为著名的是 1806 年大阪龙章堂出版的六卷本《唐土名胜图会》，该书以极其丰富、珍贵的插图见长，还列出了当时的参考书目 51 种。笔者作为北京史研究门外汉，又深爱北京的日本史学人，想在这里呼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更加注意发掘、翻译和研究日本人关于北京历史的资料文献！

当然，笔者也清楚，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日本人对北京历史的相关文献资料已经不少，并且一直受到北京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唐土名胜图会》等就早已出版了中文翻译本。

但是，也确实还有相当多的日文书，尚未翻译出版。北京市方志馆的领导独具慧眼，颇有胆识和气派，以方志馆文献编研部的工作人员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夏艳女士为首的出版团队，的确可赞可佩，他们以脚踏实地的风尚，不辞辛劳，推出这套很有学术价值、

现实意义的丛刊。笔者愿意在此向他们和四部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表示深深敬意和谢意！

笔者还想说明，现在出版的本套丛刊，具有几个鲜明的新特点：一是门类齐全，涉及北京社会各个领域、层面；二是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作者都是对当时北京的社会现状亲历亲为、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三是记述现状时，对人物、制度、事件、机构等等，均追本溯源，讲明来龙去脉，从而使一般读者能了解其由来与发展；四是叙述北京文史遗迹时，注意对相关方面的知识有所联系，特别是考虑到日本读者不大了解北京，故多是最通俗易懂的讲明，使事物保持完整性，记述颇有可读性。

同时应该指出，日本人的这几部著作也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有的作者明确写明就是为侵略中国服务的（《白云观》作者在最后说明中就明确表示，该书是为日军侵占中国后献给“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份礼物）；二是出于为给日本人阅读，故有的记述过于一般化、失之浅显；三是有不少记述存在疏漏、失误等不实之处；四是畸轻畸重，有的过于琐杂，有的又失之简略；五是叙述内容，有不少抄引于中国的相关著作，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却有失严谨，几乎每处引用都有错误疏漏；六是对当时中国及中国人在字里行间都有程度不同的鄙视和蔑视。

今天出版这些翻译著作，具有弥补北京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缺和不足的文献资料价值，因而具有学术意义；又由于日本人的研究方法、叙述特点，对我们也有一定启发；在建设文化大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北京的今天，我们正大踏步走向东亚、走向世界，从而更需要准确的了解历史上日本人如何看中国、看北京。从而本丛刊也有一定的现实、当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我们更期待北京市方志馆的领导和出版社领导一如既往的重视，并且尽快组织，使第二、第三、第四套丛刊能够持续不断地、尽快地出版。

最后，还是应该郑重的向北京史研究者们、向广大的读者们热忱地推荐这套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汤重南

于 2016 年春节

序

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的白带山麓，云雾缭绕，林麓映带，潺潺的仗引溪盘曲兜转，氤氲着一丝神秘与幽寂。这里有一处历经千载的佛教圣地——房山云居寺。这座“北方巨刹”背倚青山，门临清溪，苍翠掩映，如诗似画。寺门向东，规模宏大，寺内唐碑、辽塔，文物荟萃，珍藏着号称“三绝”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寺外东北一公里处有座石经山，俗称小西天，其得名在《长安客话》中有载：“石经山，峰峦秀拔，俨若天竺，因谓之小西天。”山腰开有九个藏经洞，寺内南塔地基侧有一个藏经地穴，共藏有石刻佛教经籍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石刻经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这部浩瀚的石刻佛教典籍世称房山石经，抑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的镌刻肇始于隋大业年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千余年，堪与闻名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作为一座综合历史文化的信息库，房山石经在历史、宗教及

艺术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的魅力在于记载千年风云变幻的古刹和石经，它们对于中国佛教研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石经的经末题记，内容十分广泛，是研究各朝代刻经的历史沿革，以及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经文后刻有题记，记述刻经的时间、地点、施主、缘由等有关内容，有些题记中的题名可与史书相印证，有的可补充史籍记载的遗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大批从事中国佛教历史学的日本专家来华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有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关野贞和塚本善隆等，他们对于房山石经的调查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以塚本善隆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在认真搜集资料、整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的《房山云居寺研究与石刻大藏经》，洋洋十余万字，论述分析力透纸背，这部作品收录于《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第五册副刊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首次围绕房山云居寺展开系统调查的优秀成果，在国际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入四十年代，村田治郎、藤田宽雅等日本学者从建筑学、佛教史的角度再次对云居寺展开调查。此后，受到中日局势的影响，日本鲜有以房山云居寺及石经为题的论文或著作发表。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学术界才逐渐恢复对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系统研究则要延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五十年代以后国内研究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著述专论和书刊高可盈尺，价值不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云居寺主体建筑的大部分被炸毁，千年古刹变成了残垣断壁，这给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这一点来看，《房山云居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

鑲而不含歷千年而經
寶藏冠人間雲居昔日
何巍壯觀持大物集群
賢一朝頭像表坤烟室
留碑碣有座家今遠或
世希有緣願觀不力法
莊嚴
修復雲居寺頌
趙朴初

赵朴初《修复云居寺颂》手迹

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兴佛之举肇始于隋代。是时，一位佛教徒为保存佛教经典，欲将佛经刻于石上，深藏于山上的石室之中，如果他日再度发生“法灭”，世间佛典被一扫而空，那么山中的石经就是佛教再兴的根本。这真是令人惊叹的旷世之志，同时也是一项绵延千载的伟大事业。唐代、辽代、金代的佛教徒秉承先师遗志，把数千卷的大藏经刻于石上，然后将其封锢于石室或瘞埋于地下。而后，元代的高丽僧又对其进行了修补。由于明清时期得到妥善维护，这些石经至今尚存。随着刻经事业的推进，当地开始兴建并经营与之相关的佛堂、僧房和石塔。许多现存的唐、辽、金、元代的石塔碑记为佛教史、美术建筑史，乃至一般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房山石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并建立了

专门的经版库加以保存。一九六一年即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研究会”正式成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任会长，赵朴初、任继愈等著名佛界学界人士任顾问。

会上，季羨林说：“房山的石经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刻在石头上的佛经。（中略）我是说云居寺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起码，在北京市哪个区有一处文化古迹能与房山云居寺相比？”由此可见，房山云居寺在北京以及全国诸多古寺名刹和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北京市地方志地情资料的收集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会的成立是宗教界与学术界的大事件，对历史研究、文物考古、民俗及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都将有重大意义，对云居寺及石经的研究和发掘更是一个促进。二〇〇六年，经国家文物局严格筛选，云居寺以“北京云居寺塔、藏经洞及石经”为名称，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的三十五项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独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二〇一一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作为北京市申遗的重点对象，云居寺随即启动了文本编制及文物测绘勘察的工作，其申遗文本由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编制。

作为房山云居寺的专题研究，《房山云居寺研究》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塚本善隆等六位学者基于一九三四年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的实地考察而撰述的，书中配有近百幅照片、插图和拓片，读者由此能够目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旧貌，为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形式提供了有力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塚本善隆、小川茂树、长广敏雄、森鹿三、能田忠

亮等五人乘“长安丸”号客轮从神户出发，二十八日抵达天津，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古物陈列所、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室和考古学研究室等机构，先后拜访了考古学专家傅增湘与戏曲研究家傅惜华。事实上，塚本善隆一行人在云居寺中仅停留三日，而且参观石经山的当日遭逢大雨，因此调查取证过程中难免有所欠缺和疏漏。然而庆幸的是，他们收集到相当数量的拓本，并以此有限的调查资料和拓本为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先行研究，完成了这部书稿。其中，塚本善隆撰《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以云居寺为基础，以刻经历史为主线，对石经山云居寺和石刻大藏经进行了全面考证。通过大量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明确指出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发愿者就是沙门静琬。静琬刻经的初衷是以备法灭，这种危机感是由北周灭佛和佛教末法思想所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怀着虔诚的佛教信仰，克服万难，代代接替，继踵相传，最后成就了房山石刻大藏经的伟业。长广敏雄针对房山云居寺砖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考证，通过十余幅照片、手绘图，直观形象地描述了北塔内外部的构造和特点。小川茂树围绕石浮图的名字、云居寺北塔下的石浮图以及石经上的石浮图等问题，对房山的石浮图展开了具体翔实的论述。森鹿三着眼于房山的地理沿革，特别是在后半部分借助《水经注》对相关河流流域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太田喜久雄则旁引了西方的多部著作和数篇论文，运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对华北及房山县的地势地貌和地质构造进行了阐释。而水野清一则参加当年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次东京城（渤海国）的发掘，而错过了前往云居寺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而后，他根据一九三〇年的实地考察撰写了《房山云居寺石塔记》，主要介绍了房山云居寺石塔的形制与雕刻，通过他细致入微的介绍，能够

了解寺中石塔的具体情况。就整体而言,《房山云居寺研究》概述了以石经事业为主的石经山云居寺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期,隋代大业年间石经事业发愿以来的历史。其中,有的章节为了得到简单的结论而不惜用冗长的篇幅进行相当复杂的考证,或是不得不以零散石刻资料的罗列结束论证,或是由于实地调查不充分,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而不得不根据第三者的资料加以推测。不难想象,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六位研究者为了收集这些文献和石刻资料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关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从事日本汉学相关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并不陌生。一九二三年,日本迫于欧美等国纷纷把庚子赔款反归于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事实,决定将庚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研究事业。一九二九年,日本文部省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狩野直喜为首任所长,内藤湖南、桑原鹭藏、高濂武次郎、松本文三郎、小川琢治、矢野仁一、新城新藏、石桥五郎、新村出、铃木虎雄、滨田耕作、小岛祐马、羽田亨任评议员。其中,狩野直喜、桑原鹭藏和内藤湖南是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专攻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桑原鹭藏和内藤湖南专攻东洋史学研究。该所遵照创设宗旨,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研究。由于地方志是有关一个地方的综合性著述,是地情指南,因此京都研究所十分重视地方志在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当时,京都研究所主要通过在华日本人搜集与收购中国地方志。一九三一年三月,作为会报的《东方学报》(京都)开始出版,平均每年一期。此外,由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分类收录前一年日本、中国、欧美各地刊行的有关中国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每年一册,逐年发行,后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者乐于利用的重要目

录。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外务省直属的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京都所改称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九四五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文部省直属大学的专门研究机构。自《东方学报》创刊以来，《房山云居寺研究》是第一本采用专题形式出版的文集。该书的六位作者包括塚本善隆、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小川茂树、森鹿三、太田喜久雄，都是近现代日本的学有专长的中国学、东方学家。

关于房山云居寺历代刻经的经过，塚本善隆论述剴切翔实。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逐渐兴盛起来。北朝时期发生的两次法难，令佛教徒刻骨铭心。他们担心法难再起，开始考虑如何保护佛经，使其历法难而不毁，长存于世。前朝将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给佛教徒以启示。于是，在北齐时期就出现了石刻佛经，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以及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胜鬘经》等。据明代《顺天府志》记载，北齐时期慧思大师曾发下宏愿，立志要将能够看到的诸佛经刻于石上，以备不时之需，但因时事动荡而始终未能付诸实践，于是慧思最终放弃初衷，决定南下。其弟子静琬秉承师训，发下要把《华严经》等十二部佛经刊刻于石的宏愿。他从石景山到白带山探寻适宜刻经的理想场所，最终选定幽州西南白带山作为大本营，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白带山下的大石窝是汉白玉的故乡，历来以盛产汉白玉著称于世，民间有“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之说。此外，青石与其他石料的储备也极为丰富，这为静琬的刻经事业提供了充足的石料资源。二是白带山树木繁茂，浓荫蔽日，野芳争艳，远隔尘嚣，既是佛僧心仪的修持之地，也是镌经藏石的理想场所。隋大业年间，刻经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业已成熟，于是，

静琬带领众徒及工匠，开始凿岩刻经之举，从而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事业。静琬的刻经事业，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扶持。隋大业七年，隋炀帝降驾白带山附近的涿郡，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其弟弟内史侍郎萧瑀施绢五百匹，受此影响，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钱财，从而为静琬的刻经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唐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静琬圆寂，他所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其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继承下来。辽会同三年（公元九四〇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归辽国管辖，辽国在云居寺做了一些建寺护经的努力，但终究未能恢复自五代以来中断的房山刻经事业。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国才有条件在云居寺恢复刻经，辽代刻经得到了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皇帝的资助。辽清宁四年（公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天庆八年（公元一一一八年），释志才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了辽代刻经的经过。到了金代，云居寺未因朝代的更替而衰落，天会十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涿州知州张玄徽首刻《佛印三昧经》，拉起了石经续刻大幕。在镌刻的石经中，除了沙门见嵩镌刻的《大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钵大教王经》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其余均藏于云居寺内的地穴中。明代石经的刊刻，是在万历至天启、崇祯年间。据现存的石经考证，这一时期刻有《法宝坛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经》等十余部，被藏入新开的第六洞，至此历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刻造事业宣告结束。

截至目前，有关房山云居寺的研究不可胜数，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首先，就研究内容和论述角度而言，本书兼具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是一部带有地方志特色的学术著作，在房山云居寺及石

经研究的同类成果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房山云居寺研究》一书中，塚本善隆以时间为主线，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交叉进行，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房山云居寺的由来与变迁，历朝历代的石经镌刻、佛塔的形制及地理沿革等问题。

其次，本书所引资料翔实，考证缜密严谨，且颇富创见。通过来华实地调查，以塚本善隆为代表的几位著者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它们成为了支撑本书论点的有力依据。在此基础上，塚本善隆等人提出了“石经山刻经事业的发愿者是幽州智泉寺的沙门静琬，且与智苑为同一人”等诸多极具说服力的观点。

第三，本书收集了上百张的照片、拓片和图片，它们记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旧貌，由于战争的破坏，这些图像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研究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独一无二的依据，这为后世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因此，本书对于北京历史文化与地情的研究，对于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因此有必要将其译为中文。

王向远 汪帅东

2014年4月30日于北京